

做学问靠脚调研，60岁迎事业“第二春”

追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凌

本报记者吴晓颖

25日晚，初夏的蓉城飘着微雨，气温骤降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凌，因病医治无效在成都与世长辞，享年93岁。

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坚定不移的推动者和实践者，他毕生坚持提真问题、做真学问，几十年来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，为中国经济改革全心倾注了智慧和精力。他在耄耋之年还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，奋战在学术研究一线，用丰硕厚重的成果践行着一位心怀天下、忧国忧民的经济学家的时代担当。

投身改革开放40年

记者26日中午来到林凌教授家中，客厅里布置了一个简易灵堂，正中挂着林老的遗像，周围摆满了菊花，不断有人前来吊唁。

林凌的二儿子何晋告诉记者，父亲5月2日感冒生病被送入医院，后来引发肺炎被转入重症监护室，近十天来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25日下午6点多医院对父亲进行抢救，19时05分父亲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逝世。

“林老住院陷入昏迷前还一直惦记着他执笔，正在修订的书稿《林凌改革四十年亲历》的编纂情况。”与林凌共事数十年的同事、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邵平说，没想到这竟成了林老最后的遗愿。

林凌原名何颖达，1926年生于山西省平定县，194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。194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专业，他曾就职于中共中央华北局、中共中央西南局、中共四川省委、首都钢铁公司、重庆钢铁公司，从事学生运动、工人运动、企业管理等工作。

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，当年52岁的林凌也迎来了个人事业上的转折点。他从中共四川省委被调入四川省社科院担任副院长，从事经济领域研究工作。

在中国经济改革各种关键性问题、重大改革实践活动背后，总能看到他的身影。林凌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体制改革、区域经济等，先后提出国有企业扩权改革、建立中心城市、发展成渝经济区等思想，亲身参与、推动了企业改革、城市改革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制定首都钢铁公司“上缴利润递增包干”方案，和推动建立重庆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。

1982年，林凌与经济学家蒋一苇在首钢调研一个多月后，提出的首钢实行“上缴利润递增包干”方案被国务院采纳，首钢改革试点取得成功后，在全国掀起一股企业承包经营热



林凌

任制浪潮。同年，林凌和蒋一苇向国务院建议在重庆市进行综合改革试点，次年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正式批准在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点，从此掀开了中国城市改革的新篇章。

研究改革开放、投身祖国的改革开放大业，既是林凌学术生涯的起点，也是他后半生从未停止的执着追求，他用丰硕厚重的成果践行着一位经济学家的时代担当。他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，两次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研究报告奖，多次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。

熟悉林老的人都说，他不是一位书斋式学者，他的理论思想不是闭门造出来的，而是靠脚调研出来的，他是位实践型经济学家。给研究生上课，林凌始终强调实践的重要性，他总结出科研“三部曲”：深入实际研究，写出调查报告，提出对策。即便年事已高，他依然坚守着看家本领“调查研究”，与年轻同事一起上高原、下工地，翻山越岭、走村入户，做了大量实地调查，步履不停。

坚持提真问题、做真学问

见过林凌的人都对他的诚挚谦和印象深

“他不是一位书斋式学者，他的理论思想不是闭门造出来的，而是靠脚调研出来的，他是位实践型经济学家。即便年事已高，他依然坚守着看家本领“调查研究”，与年轻同事一起上高原、下工地，翻山越岭、走村入户，做了大量实地调查，步履不停

刻，但他又是经济学界的“炮手”。

1978年改革之初，围绕从哪入手推进改革，有着激烈的争论。林凌认为，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，企业是生产力的基础所在，应给予企业一定的生产权、销售权、人事权等。这些在今天看似平常的作法，当时却招来许多反对声，有些人称：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“全面”“同时”进行，否则成功的机会很少；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必须在企业外部条件成熟后才能进行，否则会产生混乱。林凌不同意这些看法，写文章反驳道：企业改革是整个改革的中心环节，我国的改革必须是中国的式、逐步过渡的、不能搅乱经济生活、引起经济折腾。

在40年的研究中，林凌始终关注中国经济的走向，致力于提真问题、做经世致用的真学问。邵平评价道：作为老一辈革命者、共产党员，林老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，这种忧国忧民的强烈使命感、责任感贯穿于他毕生研究中，他坚持不唯书、不唯上、只唯实。

自幼父母双亡、家境清贫，经历了“大跃进”时期的苦涩、文革时期的暴风骤雨，林凌一生中遭遇不少惊涛骇浪，却始终保持着对国家、对他人真挚的情感。在林凌周围，有不少志同道合、并肩前行的良师挚友，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就是其中一位。

1978年林凌陪孙冶方去四川西昌、攀

枝花调查讲学，一路上孙冶方给林凌讲了许多他的经历和学术思想。虽在文革时期入狱七年，孙冶方出狱后“不改志、不改性、不改观点”，为学术研究献身的精神让林凌深受感动。“这次和孙冶方的相识相交，让老林认识到经济学关系国计民生、国家社会的前进方向，坚定了老林搞经济研究的信心，可以说孙冶方是老林的老师、领路人。”林凌发妻、90岁高龄的高众说道。

60岁是人生事业的“第二春”

“父亲常说，60岁是人生的第二春，没有家庭负担，能腾出更多精力从事喜欢的事业。”何晋说，父亲的许多重要经济研究成果都是在60岁后完成的，他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调研、写作上。

林凌过着简单而有规律的生活，晚上一般12点睡觉，早上8点起床。写作、学术交流、作报告、指导青年学生是他工作的重心。林家最大的一间房是林凌的书房，整整三面墙被装成了书柜，有近万册书。不出差时，他会每天在书房里完成六七个小时的写作。

让四川省社科院90后青年教师巨栋颇为感动的是：林老耄耋之年还奋战在科研一线，保持着高强度工作状态。他说道：“每次有课题，林老都会亲自带队调研，并撰写最重要的部分。2015年林老在外出差时间长达十个月，即便近两年他身体不太好，还是坚持在病床上写稿、改稿。”

一些受访四川省社科院毕业生、青年学者告诉记者，身为德高望重的老学者，林老没有一般“权威”的威严，也没有一般老年人的保守，能很快接受新鲜事物，和年轻人打成一片。

“他最喜欢用的工具是电脑，经常通过电子邮件给我们发一些文章，还会跟我们交流最近的新闻。”巨栋说，永葆一颗年轻的心，对科研充满激情，这或许正是林老保持长久学术生命力的重要原因。

在林凌的小孙子何夏阳看来，虽然在他的一些重大人生选择中祖父很少干预，但在潜移默化中总会受到祖父的影响。从国外留学回国后，他进入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成为了一名结构工程师，投身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事业。在遇到困难时，祖父自强不息、乐观豁达的精神，成为鼓励他不断前行的“精神航标”。

新华社记者余靖静

1998年，享誉世界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因病逝世，20年后，人们是如何追忆这位科学家的？

浙江大学25日举行弘扬王淦昌精神座谈会，追思这位杰出校友为国家为学校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，弘扬他的科学思想和精神风范。

王淦昌留学时，是著名实验物理学家、德国柏林大学教授迈特纳唯一的中国学生，他26岁就成了物理学博士，学术前途无量。他却于1934年毅然回国。面对挽留自己的导师，王淦昌说，“我是中国人，来德国求学，为的是报效祖国。”

“对祖国的无限热爱，是王淦昌先生最珍贵的品质。”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郑强说，那个年代的教授，主动回到山河破碎的国家，“以身许国，谈何容易？中国的骨头就在这里。”

王淦昌回国后，受竺可桢邀请，于1936年起在浙江大学任教。1937年秋，抗日战争爆发，浙江大学被迫西迁，历时两年半，横穿六省，落脚贵州湄潭继续办学。

王淦昌体弱多病，得了肺结核。为了补充营养，妻子买了几只羊，王淦昌每天从家把羊牵出，拴在双修寺外草地上，然后走进设在寺内的物理实验室，做完一天的实验，再牵着羊回家。

“实验器材都是师生们自己做的。靠废旧汽车发动机带动的一个小发动机，是唯一动力源。”贵州湄潭浙大校友馆馆长阴利君说。

身居陋室，“羊信教授”王淦昌却做着世界科学最前沿的工作。1941年，他在国际权威杂志《物理评论》上发表《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》，由于战乱，没有条件用实验来证明中微子的存在。在美国，物理学家艾伦据此开展了实验，实验名为“王淦昌—艾伦”，美国科学家莱茵斯和考恩“接棒”后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。

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，不止这一次。1961年，上级选派王淦昌参与研制战略核武器原子弹。此前不久，他刚在苏联联合核子研究所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，这是一个世界级的成果。

“接受这个安排，对王淦昌先生来说，就是要抛弃他心爱的专业，改做不熟悉的工作。”81岁的中科院院士贺贤土说，如果能够继续在原来的科研领域工作，王淦昌很有可能叩开诺贝尔奖的大门。

1961年，上级选派王淦昌参与研制战略核武器原子弹。此前不久，他刚在苏联联合核子研究所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，这是一个世界级的成果。

“一个国家的民族，应该有一些东西是永恒不变的，譬如精忠报国、永远值得弘扬和礼赞。”浙大物理学系校友、从事国防研究的朱少平说。

王淦昌在浙江大学工作16年。在浙大的师生、校友看来，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，也是一位伟大的教师。

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曾回忆在湄潭求学的情形，“当时我仅16岁，对工料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，慢慢地和束星北、王淦昌二位物理学教授接触多了，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学科的意义和重要，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。”

王淦昌是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。另一位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程开甲，是王淦昌的学生。2017年，居住在北京的程开甲给母校写来了一封信，“我非常感谢浙大求是精神和大师们给我的宝贵财富”。

“我去拜访程开甲先生，年过百岁的老人念念不忘的是，王老当年是怎么教学生追求真理的。”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说。

浙大物理学系退休教师、89岁的吴璧如，是在1948年秋天来浙大念书的，“1949年王先生从美国访学回来，给我们本科二年级的学生开课，上了一年。”

“老师工作很忙，但很重视对学生的培养。”吴璧如回忆说，除了上课，当时班上十几个同学，每周六都相约去老师家交流，“老师是国际知名专家，我们当时20来岁，提问很幼稚，他却从不嫌烦，耐心解答，还有意识地引导我们用正确的学术方法。”

“现在浙江大学物理学系，王淦昌精神”就是师德师风的代名词。“浙江大学物理学系党委书记顾毓说。

81岁的中科院院士贺贤土说，自己在中学时对文科、理科都很感兴趣，是当时观看的一个关于王淦昌先生讲核物理科学的录像，促使他下定决心报考物理专业。

“90后”浙大物理学系研究生靳佳明说，无论是小学时看“两弹一星”元勋的故事，还是2017年暑假去王淦昌等先生“战斗”过的青海原子城的探访，王淦昌先生“以身许国”的精神，都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，“即使在他逝世20年后，依旧令我们思索，何为家国情怀。”

1984年，德国西柏林自由大学授予王淦昌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荣誉证书。这个被德国人称为“金博士”的荣誉，是专门为获学位50年后仍站在科学第一线的科学家们设立的。

“王先生曾说，我始终怀着极大的兴趣研究新现象。”87岁的中科院院士唐孝威回忆说，20世纪80年代，自己在高能所工作时，贝时璋先生建议，“你应该用物理的方式探索生命科学。”王淦昌先生听说后，非常赞同这种交叉学科的方法。其后，他还自己带头翻译国外生命科学著作，进行科普。

吴璧如回忆，1997年，王淦昌来杭州参加浙江大学成立100周年活动，特意把当年的学生叫来叮嘱，“生物物理是很值得探索的前沿学科”，“当时王先生已经90多岁，外出需要坐轮椅，他还在不断考虑前沿研究，一生献身于物理。”

新华社杭州5月26日电



▲2018年5月25日，由王淦昌家乡江苏省常熟市捐赠的王淦昌铜像，落户浙江大学。(浙江大学物理学系供图)

一位社区医生要调走，700多村民按手印挽留

新华社宁波5月26日电(裴立华、张夏珍)近日，一段短视频在宁波网民的朋友圈热传。视频中，宁波市奉化区莪湖卫生院桐照分院门口聚集了七八十位村民，大伙儿把拟提拔离任的分院长周平团团围住，纷纷表达难舍之情，使其一度无法前行。在周平以及闻讯赶来的村支书的极力劝说下，村民们才渐渐散去。

但大伙儿实在舍不得，700名村民联名按下手印，希望不要将周平调离，“我们太需要这样的好医生了”。

莪湖卫生院桐照分院只有4名全科医生、1名牙科医生和4名护士，一般每天安排两名医生坐诊，而平均日门诊量却有170余人。

2012年6月，因业务能力突出，在其他街道卫生院工作了15年的周平，被任命为莪湖卫生院桐照分院院长。在村民眼里，周平可不是什么院长，而是一位什么毛病都会看的“神医”，就连附近村的百姓，也更愿意来这儿看病。

村民林爱浓的丈夫两年多前只是感觉小便略有不畅，并无疼痛等异常，周医生却让他尽快去做核磁共振，结果果然不好，幸亏发现及时，做了手术。

“我哪有这么神奇。”对于村民的褒奖，周平显得很不好意思。他说，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，责任心驱使他不断加强学习，多年的临床经验又让他对基层百姓的常见病、多发病非常熟悉，来桐照分院后，脑中慢慢建立起一份份健康



▲从学校毕业后，周平一直扎根基层卫生院，为当地群众提供医疗服务。

▲700名村民联名按下手印，希望不要将周平调离。



▲从学校毕业后，周平一直扎根基层卫生院，为当地群众提供医疗服务。

▲700名村民联名按下手印，希望不要将周平调离。

档案。常常找他看病的村民的既往病史甚至生活习惯，周平都了然于心。

除了过硬的医术，让村民不舍的，还有周

亲召回。

“直到父亲去世，我才开始理解他当初的决定，林子总得有人守着，即使他知道有多苦。”马晓华说，回到沙漠边那年，他只有23岁，荒凉与辛苦让他也怨过父亲。

“现在有了机和管道，浇水方便多了，打开阀门，看树喝水。以前每次和父亲浇水前，都要一点一点清理出渠道里的沙子，所有的树浇一遍，至少得一个月。过去风沙大，黑风一吹，根本找不到回家的路，我们父子就躲在沙包后面，头发里、衣服里、嘴里都是沙子。”马晓华回忆。

在父亲的带领下，马晓华开始熟悉这份苦差事，也开始与树有了感情。2006年，父亲因病住院，但因为当时林带正需浇水，他无法抽身，直到父亲去世前3天，他才赶到父亲身边。“这是一辈子的遗憾。父亲临走时说让我把他埋在沙漠边。”马晓华说。

“看着林子，就想起父亲，所以我怎么能放弃？”如今，马晓华依旧每天早上7点准时出发，为长为20多公里的林带浇水，饿了一口干粮，渴了一瓢凉水，累了睡在林边，日日如此。马晓华说，现在的天还算舒服，一到盛夏，地都烫脚，不穿长袖会晒掉胳膊上的皮，而冬天下40摄氏度的低温更是难熬。

林带外围是马晓华看护的国家公益林，1万多亩的梭梭、红柳等植被安全由他负责。每周，马晓华都会骑着他的二手摩托车巡逻两次。

“看到有人砍伐，一定要阻止，也被人威胁过，也被人骂得像野人一样，但是这片公益林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种，长到现在，稳住沙尘，太珍贵了。”马晓华说。

为了这些树，马晓华的左眼几近失明。在一次浇水时，沙枣刺扎进了他的眼睛，造成真

平的真心、耐心、细心。

村民们说，从未见过周医生皱眉头，不管忙不忙，他的态度始终如一的好。有时诊室人多嘈杂，后面的病人忍不住会嚷嚷，周平总是笑眯眯地说：“再等等呀，大家别心急，我会一个个看完的。”

每次诊断完，周平都细心地将病情跟病人说清楚，提醒他们要注意什么。“将心比心，要是自己是病人，也希望医生能多了解病情。”因此，周平常常错过中午饭点。

“他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好。”村民林大爷说，无论是谁需要去奉化城区的医院做进一步检查，周医生都把去哪家医院、在几楼看哪科门诊写得一清二楚。

桐照敬老院长长期住着三四十位老人。从2016年起，每隔半个月，周平都会去给老人们检查身体。“每次他一个都不会落下，有几位老人卧病在床，他也记得。他从不嫌弃老人家身上有异味，总是笑眯眯的。”在敬老院长长吴越娟眼里，周平是个“活雷锋”。

从学校毕业后，周平一直扎根基层卫生院。“虽然在基层，看的都是小病小痛，但获得的成就感并不比在大医院里的少。”他说，每次面对群众肯定的眼神，由衷的感谢，心里就非常满足。

菌感染，因为没有及时就医，视力模糊再也无法恢复。因为长时间浸泡在凉水里，马晓华的手和膝盖也落下了关节炎。

如今，马晓华每月依旧只有2500元的工资，他只舍得给自己买15元一双的鞋子，鞋底太薄容易被沙枣刺刺穿，他就往鞋里垫上厚鞋垫。与父亲住过的房子也已破败不堪，马晓华搬到了几百米外一间20世纪80年代建成的空砖房里，直到现在，这个“偏僻”的房子还没有通上自来水。“妻子为了照顾上学的儿子，住在团场，但他们支持我。”马晓华说。

从2006年开始，150团依靠全团职工，种下了一条宽100米，长100公里，总面积达1万亩的环团阻沙基干林，成为我国三北防护林工程在新疆的一部分，在马晓华守护下的林带树木存活率达到85%以上。

新华社乌鲁木齐电

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的两代守护人

新华社记者白佳丽、周生斌

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南缘，马宗辉、马晓华父子用26年的时间，管护着380亩防风基干林、1万余亩国家公益林，为阻挡沙害的林带延续生命。

在我国第二大沙漠的南部，有一片绿洲向沙漠腹地延伸了近70公里，那是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150团的“奇迹”。在20世纪50年代，数千名军垦战士开始在沙海边植树，为了把树种活，战士们把百里之外运来的食用水留给了小树苗。

20世纪60年代，马宗辉从甘肃老家来到150团，垦荒安家。1992年，团里急缺护林员，马宗辉便带上全部家当来到无人居住的沙漠边，开始用一己之力守护团场几十年种下的绿色。3年后，马晓华手握军功复员回家，本应成为150团一名“有身份、有地位”的工人，却被父